

ZHONGRI GUANXI ERSHI JIANG

中日关系二十讲

进入21世纪短短几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数重考验与变幻。为何日本前首相小泉一意孤行，导致中日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友好大厦几近倾颓？为何继任者安倍晋三一反常态，大刀阔斧破冰示好？围绕中日之间敏感而又脆弱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从纵向梳理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曲折道路、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政冷”关系，以及“后小泉时代”——新任安倍内阁的政策走向，从横向揭示了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政治障碍，以及伤害民族感情的历史认知问题，既准确地把握住了中日关系的脉象，诊断出了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又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出了极富创见的良方。

刘江永 著

国际关系丛书

中日关系二十讲

刘江永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关系二十讲/刘江永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国际关系丛书)
ISBN 978-7-300-08333-9

I. 中…
II. 刘…
III. 中日关系—研究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1994 号



国际关系丛书
中日关系二十讲
刘江永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 (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 (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8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3 000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拙著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之际奉献给读者，首先要感谢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鞭策。由于同年 2 月，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我的一部专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所以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约稿后，我开始有些犹豫，生怕时间仓促，难以再完成一部类似的专著，最终辜负别人的好意。无奈，出版社的编辑再三鼓励，多次催稿，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而且从命就得“拼命”。毕竟完成一部书稿比撰写一篇论文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好在本书内容与我近期研究的问题非常接近，平时也有一定积累。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把近年来相关研究作了一番系统梳理，并着力跟踪研究了中日关系的一些新的发展变化以及面临的重要问题。本书首先从近代亚洲观的变迁与中日关系入手，重点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若干重要问题的解决过程，总结了中日关系的某些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两国关系的各个侧面。此刻，恰值中日关系度过所谓“政冷经热”阶段，迎来政治关系转圜的重要时期，但两国关系中仍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双方共同面对和妥善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相信书中有关看法也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三国志》有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人解释说：“如登，喻难；如崩，喻易。”笔者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的中日关系也颇为恰当。中日两国虽为近邻，但由于历史问题与现实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

改善难而恶化易。特别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蔓延的情况下，两国关系更是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都要特别珍惜彼此关系的改善，继续知难而进，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日本自古崇尚中国文化。天皇年号多出自中国古代典籍。如“明治”，出自《易经》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出自《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出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则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和《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天皇及皇室成员的名字也多从汉籍中选择一些有一定含义的汉字。例如，德仁皇太子女儿的名字叫敬宫爱子，这便取自中国《孟子·离娄篇》中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遗憾的是，如今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却不太愿意承认同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认同，而刻意强调日本与美欧有共同的价值观，视中国为“另类”。目前，日本在外交上强调，日美两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关系，日中两国则只是“战略互惠关系”。日本政要并不讳言，他们推进这种关系的目的是获取利益，而友好只是手段。这或许是由于战后长大、现在掌权的日本政要大多是从冷战时期开始一直受到美国文化及战略思维熏陶的结果。同时，他们又不能不重视中国，因为2007年中国毕竟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在战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今后中日两国日益密切的人员交往中，双方会从文化与习俗方面发现许多彼此相通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点。中国要保持本国的文化魅力，中国人自身应该首先努力珍惜、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粹。

有些学者认为，日本独有的宗教——神道也曾受到中国道教的影响。在笔者看来，日本恐怕永远也离不开一个“道”字。这当然不光是指日本的茶道、书道、剑道、柔道、空手道或武士道。何为“道”，此处是

指事物无形之规律。中国古代道家有言：“圣人处无为之事”；君子“莫若无为”；“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若用中国道家思想解释日本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可以说，合乎道则生则荣，逆于道则亡则衰。对日本来说，这种“道”，首先是指在国际社会使用武力问题上的无为，即“无为而治”、“无为而和”、“无为而生”、“无为而荣”。相反，若逆道而行，自以为与强者为伍便可“恃武有为”、恃强凌弱，最终只能咎由自取，正所谓“有为而乱”、“有为而危”、“有为而亡”、“有为而衰”。这就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基本轨迹——未来大概也摆脱不了的民族宿命。

从善如流，上善若水。这两句话，前者出自《左传·成公八年》，后者出自《老子》第八章。所谓从善如流，是形容乐于接受别人的好意与建议，像水顺流而下那样迅速而自然。所谓上善若水，是指最好的美德犹如流水。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大意为：水给万物带来利益却不与万物相争，默然流向人们都不喜欢的低处。因而有像水这样美德的人，就接近于“道”了。中日两国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亚洲其他邻国的关系时，除了重利益、讲友好以外，或许也可从这两句中国的古训中得到一些启迪。

日本自称“大和”民族，但在历史上却不幸地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科技成就。然而，日本未来是否会再度构成对邻国的军事威胁，一直是亚洲邻国关注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地缘战略意识上，日本似乎还缺乏一个“和”字，经常有人错误地总结日本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宣扬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必然与“大陆国家”发生利益冲突和对抗，甚至把中国的台湾也作为牵制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棋子。若根据这种传统的地政学思想制定政策，日本实际上是把自已置于同中

国等大陆国家进行地缘战略对抗的状态，而难以同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

如果日本的决策者能认清当今时代特点，就会发现，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实现和平、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外交战略，“海陆和合”是避免“海陆对立”，实现“海陆共赢”的必然选择。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和平、合作才对各方都有利，而若以海陆画线树敌立友，人为制造“威胁”或对抗，到头来只能是损人害己。而坚持“海陆和合”，不仅不会冲击日美关系，反而可能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协调发展的一条出路。因为“海陆和合”同样包括提倡日美之间的“海海和合”。21世纪，中美日之间能否长期和平共处，扩大合作，是东亚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关键所在。

刘江永

2007年7月

目 录

第一讲 日本近代亚洲观的变迁与中日关系	(1)
一、日本近代侵略扩张政策的始作俑者	(2)
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4)
三、“亚洲门罗主义”与“大东合邦论”	(6)
四、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	(8)
五、“自由民权”亚洲观与“和平同盟”理念	(11)
六、从“东亚协约体”到“大东亚共荣圈”	(13)
七、影响日本与亚洲和睦相处的思想渊源	(15)
八、孙中山的日本观、亚洲观之转变	(19)
第二讲 战后国际法中的日本	(22)
一、《开罗宣言》确定日本侵占领土的归属	(22)
二、不仅仅是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	(24)
三、战后日本国际行为的基准	(25)
四、战犯罪孽要受到追究而不得美化	(26)
第三讲 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曲折道路	(30)
一、起步艰难 一波三折	(30)
二、时来运转 人心所向	(31)
三、好事多磨 水到渠成	(32)
四、恪守三个政治文件 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36)

第四讲 大平正芳与中日关系	(40)
一、大平的中国观与历史观	(41)
二、疾风知劲草	(43)
三、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功臣	(49)
四、打通中日航线和缔结中日和约的推动者	(58)
五、第一位在中国作演讲的日本首相	(63)
第五讲 21 世纪初“冰封期”的中日政治关系	(69)
一、日本国内对日中关系的看法分歧扩大	(69)
二、中日民间感情恶化	(72)
三、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症结所在	(77)
四、中日政治关系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87)
第六讲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中日关系	(95)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与国际意识	(95)
二、“爱国教育”导致反日吗?	(101)
三、为什么不能盲目抵制日货?	(106)
四、中日关系中媒体的角色	(109)
第七讲 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	(112)
一、日本对华 ODA 对中日双方都有利	(112)
二、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对华 ODA 政策调整	(116)
三、21 世纪初日本对华 ODA 方针的变化	(121)
四、如何推进未来的中日合作	(127)
第八讲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前景	(130)
一、中日经贸往来降温对日本更不利	(130)

二、中日货币汇率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136)
三、中日关系倒退源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倒退	(138)
四、中日经贸关系的制约因素与前景	(140)
第九讲 如何认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	(144)
一、历史问题为何会影响现实的中日关系	(144)
二、关于东京审判问题	(149)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	(153)
四、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	(157)
五、关于是否“干涉内政”问题	(164)
第十讲 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	(167)
一、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和由来	(168)
二、围绕靖国神社的斗争	(171)
三、小泉首相为何执意参拜靖国神社	(174)
第十一讲 靖国神社不能代表日本传统宗教文化	(177)
一、靖国神社问题与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	(177)
二、日本宗教文化中对亡魂有善恶之分	(179)
三、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中设有靖国神社的位置	(183)
四、日本宗教文化中妨碍正确认识历史的因素	(186)
第十二讲 评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民间索赔案的判决	(190)
一、事情的原委与问题的提出	(191)
二、《旧金山和约》管不了中国的事	(196)
三、“日华(台)和约”根本不足为据	(205)
四、《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所有对日索赔权	(211)

五、基本结论与前景分析	(216)
第十三讲 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展望与建言	(226)
一、问题的复杂性与斗争的长期性	(226)
二、邓小平如何拿捏、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229)
三、处理历史问题的建言	(233)
第十四讲 21 世纪初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36)
一、日本战略走向与日美同盟的转型	(236)
二、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因素	(243)
三、美日对华政策的异同	(249)
四、日本自陷战略困境	(252)
五、错误的战略思维在误导日本	(254)
六、加强中日安全对话 消除两国战略误解	(258)
第十五讲 日本的国内形势、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	(263)
一、21 世纪初的日本经济、政治形势	(263)
二、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	(269)
三、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	(273)
四、日本战略走向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77)
第十六讲 小泉内阁对华战略与中日关系	(281)
一、小泉执政末期的中日关系	(281)
二、小泉内阁对华战略、政策与策略	(284)
三、小泉的右倾化大国路线与中日关系	(288)
四、政治右倾化导致日本在国际上孤立	(293)
第十七讲 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	(297)

一、小泉后的日本政局	(297)
二、安倍晋三的政治倾向与中日关系	(305)
三、安倍访华后的中日关系	(318)
第十八讲 从“融冰之旅”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325)
一、温总理“融冰之旅”的三大亮点	(325)
二、中日关系从“政冷”到融冰的背景	(331)
三、改善中的中日关系还会面临挑战	(339)
四、“价值观外交”与“战略互惠关系”	(343)
第十九讲 从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看中日关系走向	(353)
一、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353)
二、东亚形势的发展变化	(374)
三、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380)
第二十讲 东亚共同体、地缘战略与中日关系	(395)
一、21 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	(395)
二、日本谋划东亚共同体进程中的对华战略考虑	(407)
三、“海陆和合论”——中日共建东亚共同体的地缘战略理念	(415)

第一讲 日本近代亚洲观的变迁与中日关系

21 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在加强,但前进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阻力,这主要是来自日本方面与历史问题相关的政治因素的干扰。迹象显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不仅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与中、日、韩等国能否顺利开展东亚合作密切相关。因此,在积极推动东亚合作的同时,有必要对历史上日本亚洲观的源流加以分析,从中找出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2005 年 12 月,首届东亚峰会在吉隆坡举行。会议的召开反映出东亚区域合作取得新的进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与问题。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韩两国领导人没能在东亚峰会同日本首相会晤。会后,小泉首相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在国会答辩中称:世界上除了中、韩领导人批评他参拜靖国神社以外,其他国家没有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他在国际上并不孤立,还将继续参拜。照此发展下去,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仅会成为改善中日、韩日双边关系的症结,还将有损东亚区域合作的健康发展。本讲拟通过分析近代日本侵略亚洲的思想源流,总结历史教训,提出值得思考和警惕的问题所在,防止重犯历史错误。

一、日本近代侵略扩张政策的始作俑者

日本近代的侵略扩张政策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1537—1598)和佐藤信渊(1769—1850)的时代。在殖民主义时代,亚洲成为列强争霸的对象。1588年,英国海军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并开始向亚洲扩张。在东亚,丰臣秀吉刚实现日本封建国家的统一,便于1592年和1597年先后两次出兵朝鲜,企图先占朝鲜,再征服中国和印度,定都于北京。这堪称是日本近代侵亚谋霸战略的发端。^①明朝政府出兵后,丰臣侵朝失败。其后,直到1853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直逼江户湾,迫使日本开国,日本实行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除海盗倭寇骚扰外,中日之间维系了近270年的总体和平。从那时起,伴随国际风云的变幻,日本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亚洲观。日本甲级战犯大川周明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打自招地宣称,“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绝不是今天产生的想法,它从近代日本为了国民统一而奋起时开始,便成为连绵不断的追求目标”,“如果写日本近代史,我将首先从叙述佐藤信渊的思想开始,因为这位伟大学者的灵魂中已经孕育了新日本非常具体的姿态”^②。

佐藤信渊是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思想家。在美国提出“门罗主义”的同一年(1823年),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明确提出,“皇国

^① 丰臣秀吉1592年指挥陆军19万人、水师9000人,自釜山登陆,逼近首尔、平壤,日本史称“文禄之役”。战败后,丰臣又于1597年派兵14万大举侵朝,日本史称“庆长之役”。明朝出兵援朝,日军两战皆败。

^② [日]大川周明:《大东亚秩序建设》,载《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771、773页,岩崎书店,1962。

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若强大支那且不敌吾皇国，更况其他夷狄乎”，“支那划归吾版图，余等西域、暹罗、印度等国则将遂慕吾之德，惧吾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称臣”。其步骤是，先占黑龙江，再占吉林，控制“满洲”后征服全中国。佐藤信渊还狂称：“以此神州之威武，征彼蠢尔夷蛮，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①这种称霸世界的狂妄欲念，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独一无二的。这便是百年之后日本走上侵略亚洲道路的深刻思想根源。

佐藤信渊侵略亚洲邻国的主张绝不是孤立的。德川幕府末期，日本面对俄、英、美叩关，兴起所谓“经世学派”，鼓吹日本“海外雄飞论”和“尊皇攘夷论”。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吉田松阴(1830—1859)，他主张倒幕维新后，日本应“乘隙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夺取满洲，占领朝鲜，合并南地，然后挫美折欧，则事无不克”^②。他强调：“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③他主张占据整个中国，“君临印度”，“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官方至今否认存在的“田中奏折”的思想原型及“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雏形。吉田松阴对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影响极大。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明确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所谓“列祖列宗的伟业”自然包括丰臣秀吉，表露了日本明治政府继续向外扩张和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

① [日]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载《日本思想大系 45 佐藤信渊》，426 页，岩波书店，1982。

② [日]《吉田松阴全集》第 1 卷，298、325 页，岩波书店，1940。

③ [日]《吉田松阴全集》第 2 卷，596 页。转引自关捷、唐功春、郭富纯、刘恩格总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五卷思潮篇，12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蔑视中国和朝鲜的“脱亚论”创始人是福泽谕吉(1834—1901)。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效仿欧洲列强,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做亚洲盟主。福泽谕吉在日本被视为近代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是日本一流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办者和《产经新闻》的前身《时事新报》的创始人。他的肖像至今仍印在日本货币最大面值1万日元的钞票上。

1878年,福泽谕吉发表了《通俗国权论》一文,主张日本对外武力扩张。文中称:“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的道理只有两条:一是消灭别人;一是被他人所灭。”面对国内各种矛盾,他主张“促使一国人心奋起、感动全体的最好方法,莫如对外一战”,“敌国外患,乃团结人心、强固立国之本的良药”,“依我之见,主张对外一战则未必是好战,不好战则不忘战争”,“战争有长久振奋人心的巨大力量”,“唤起吾国民报国心之方法莫过于发动战争”^①。

1881年福泽发表《时事小言》,进一步把动武的矛头直指中国。他断言,“中国人若不引进蒸汽电信之类文明利器则会亡国,而引进之则政府被颠覆,二者难免其一”,故日本不能坐失良机,“当此(中国)变动之际,我日本国决不能袖手旁观”,“方今东洋诸国中,处于文明中心,作为魁首与西洋诸国抗衡者,舍我日本国民则为谁耶?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日本的责任”^②。

① [日]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孙卫东、徐伟桥、邱海永译,18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② 转引自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上卷,363~36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1883年福泽在《时事新报》社论《外交论》中宣称,当今国际关系是“禽兽相斗相食”的关系。食者为文明国,被食者为半开化国、野蛮国。日本外交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加入吞食“不文明”国的“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共觅“良饵”;二是与数千年来萎靡不振的亚洲古国为伍,同守古风,被“文明国”人所吞食。因此,日本所应选择的道路,只能是第一种途径,即加入帝国主义阵营,成为“亚洲东睡一新的西洋国”^①。

1885年3月,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其观点后被概括为“脱亚入欧论”。文中称:“吾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之东睡,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之文明……不幸乃近邻有两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人民……罔知改进之道,在交通至便世界,虽非未闻文明之事物,但耳闻目睹却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之活舞台……傲然无自省之念。”福泽断言:“视此两国,面临当今文明东渐之风潮,已无维持独立之路可走……自今不出数年,定将亡国,其国土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此种结局,毋庸置疑。”^②他认为,“唇齿相依、邻国相助”之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我们在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唯恐西洋“文明人”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一视之”,造成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其结论是:“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文明,共振亚洲。毋宁与其脱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支那和朝鲜交往之法也不必是因为邻国而特别客气,而只应以西洋人对待其之方式处置。”^③这里,日本的“脱亚论”已演变为居高临下的“欺亚论”、“侵亚论”。

甲午战争爆发后,1894年12月,福泽又兴奋地接连发表文章叫

① [日]福泽谕吉:《外交论》,载《时事新报》,1883年9月20日至10月4日连载社论。

②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载《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

③ 同上。